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Integration & Invention:

A Study on Cai Yuanpei's Viewpoints of Sino-Western Culture & Education

.....

融合创新论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历史研究

葛新斌◎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Integration & Invention:

A Study on Cai Yuanpei's Viewpoints of Sino-Western Culture & Education

融合创新论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历史研究

葛新斌◎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融合创新论: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历史研究/葛新斌
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ISBN 978-7-5068-3427-8

I. ①融… II. ①葛… III. ①蔡元培(1867~1940)—
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6789号

责任编辑/刘洁琼

责任印制/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8-3427-8

定 价/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想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往往发端于几种文化接触的时代。

——蔡元培:《在檀香山华侨招待太平洋教育会议各国代表宴会上演说词》

我们感受了寒温热三带变换的自然,
我们承继了四千年建设文化的祖先,
曾经渗透了印度哲学的中边,
而今又感受了欧洲学艺的源泉。
我们要同日常新,
我们要似海纳百川。
我们现在彻底的受了母校的陶冶,
将来要在全世界发扬我们国光而绵绵。
啊!我爱我的中华万年!
啊!我爱我的母校万年!

——蔡元培:《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歌》

序 文

葛新斌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他读大学的时候,我曾上过他们班的“中国教育史”课程。记得他常在课间休息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跟我讨论。印象中,那时他就是个很爱思考的年轻人。后来,听说他跟随教育管理学院的安文铸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去了广州教书。然而,不久他却跟我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回到母校继续深造,于是,他就成了我招收的博士开门弟子。记得博士论文开题时,他最初选择的是中国近代道德教育观演变方面的课题。后来,据说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最终他又把论题定在了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之上。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古今中西”之争就成为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蔡元培以其“融合创新论”对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应答。不过,过去学术界对蔡元培思想的相关研究,较多地集中于他的“五育并举”、大学教育和美育思想等方面,而对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却较少着墨。葛新斌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本《融合创新论——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历史研究》,就是选取以往大家较少涉猎的中西文化教育观这一重要领域,形成的一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研究成果。

十多年之后,这项成果即将印行于世,我自然十分高兴。重新披览书稿,我觉得,葛新斌的这本著作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本书选题较为新颖,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从整体上看,作者能够抓住蔡元培思想中很有特色价值而国内外研究中又相对薄弱的“古今中西”关系问题,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考察和探究。本书以“融合创新论”为中心,探讨了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演进过程,进而分析了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形成的多重影响因素,重点阐发了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主要内涵,并提炼出蔡元培关于文化教育融合与创新的机制和途径,然后对其“融合创新论”作出了较为客观和公允的评价。这对蔡元培思想的全面深入研究,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本书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学术见解。譬如,本书对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形成“四阶段”的相对区分,对蔡元培“融合创新论”影响因素的条分缕析,已经较有新意。作者把蔡元培“融合创新论”概括为“接触→择善→吸收→消化→创新”这一中外文化教育的融合与创新机制,以及对蔡元培创造性地转化西方古典自由观的详尽分析,均能“成一家之言”,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作者对蔡元培“融合创新论”的理论特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深入阐发与大力表彰,不仅透露出作者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和良好的“史识”,而且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意义。

最后,本书占有文献资料翔实,述论晓畅透辟。蔡元培一生历经前清翰林、创办新式教育、开展反清“沪上革命”、游学欧洲、出任民国教育总长、革新北大、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运作以及出掌中央研究院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的言论繁多,思想驳杂且变动不居,相关资料异常丰富,因此,研究蔡元培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然而,作者却能够迎难而上,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于细致爬梳剔抉之后,独出机杼,把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教育思想概括凝炼为“融合创新论”这一鲜明的观点。然后,作者又能通过严密的论证和晓畅的文字,透辟地阐发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也显示出作者较好的驾驭史料和文字的“史才”。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特点,答辩委员会当时即给予了葛新斌较高的评价。虽说学术研究是永远都会留下“遗憾”的工作,然而,从更高的要求看,作者若能再对蔡元培“融合创新论”的深层思想基础等方面展开更加详尽的探讨,也许就会为本书减少一些“遗憾”吧?当然,由于工作上的安排,作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后

就离开了“蔡元培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于是,上述“遗憾”也就以这本书现在的样子,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了。

“婴其鸣矣,求其友声!”拉拉杂杂写下了上面的话,以为序。

郭齐家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

前 言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使“中西文化”之争成为贯穿于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位关键性人物,蔡元培以他的“融合创新论”对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答。本书旨在剖析“融合创新论”形成背景及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力求探明它的基本内涵,并尝试估定它的实际影响与历史价值。

蔡元培的中西学教育经历,对他“融合创新论”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他在旧学教育时期独特的“自由阅读”和“徐氏校书”经历,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广博的旧学基础,而且使他初步形成了不拘门户、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而他在旧学已有深厚根柢的情况下赴德留学,又使他能够把握到西方文化教育价值观的精髓所在。伴随着他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他对中西文化教育关系的看法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这反映在他依次提出的“中西暗合论”、“益己益世论”、“吸收消化论”以至“融合创新论”之中。

蔡元培最终能够形成“融合创新论”的思想基础是:第一,中庸调和之道,使他确立起中西融合而非对立的观念;第二,社会文明进化论,使他相信人类文明一定能够不断进步;第三,世界和平互助论,使他感受到中西文化教育融合的必要性;第四,人类普遍价值论,成为他沟通中西文化教育的重要桥梁。此外,他那大度包容的人格特征,使他具有一种包容古今中外一切文明优秀成果的阔大心胸;他在德法等国游学时所处的友善开放境遇,也有助于他客观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价值。

在上述理念引导下,尤其是在综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后,蔡元培坚信:中

西方文化教育是完全能够融合的。从历史事实出发,他提出: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是文化教育创新的前提和动力;文化教育融合的基本方式,是主体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吸收;文化教育融合的根本目的,是在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本民族新的文化与教育。从此出发,他认为:尽管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其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处。这不仅表现为中西文明演化程序上的相似性,更体现在它们内涵的接近上。尤其是“科学”与“美术”,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是中西文化教育融合的共同基础。具体到中西文化教育间的现实关系上,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大弊端,是“应试”和“被动”;西方文化教育的精髓所在,是“科学”与“美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个别教育和书院精神等遗产,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军国主义、物质主义和宗教干扰等因素,是西方文化教育之糟粕。因此,他提出:应该在“以我为主,食而化之”原则的指导下,对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择善而从之”。然后,再经过中国自己的“消化作用”,创造出无愧于人类的新文化与教育。

蔡元培的“融合创新论”,既看到中西方之间的共同处,而主张学习西方;又看到传统遗产的现代价值,而主张继承传统。既肯定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而坚持文化教育融合;又肯定民族文化教育的独特性,而主张创造中国新文化。与“东方文化派”不同,它在学习西方时没有预设范围;与“全盘西化论”迥异,它始终坚持中西融会贯通。所以,蔡元培的“融合创新论”,较好地解决了新文化教育建设中的学习与创新、继承与发展、民族性与普遍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它在理论上,有着远比“东方文化派”和“全盘西化论”更多的合理性;而在实践中,它也成为真正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文化教育建设之路。正是在“融合创新论”的牵引下,蔡元培为中西文化教育融合做出了杰出贡献。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章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演进过程之梳理	9
第一节 蔡元培的中西教育经历与中西学术造诣	9
第二节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演变与形成	24
第二章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影响因素之剖析	38
第一节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思想基础	38
第二节 影响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其他因素	58
第三章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基本内涵之探讨	74
第一节 蔡元培对文化教育之理解	74
第二节 蔡元培对中西文化教育关系之把握	87
第三节 文化教育创新之机制：“接触→择善→创造”	108
第四节 文化教育融合之途径：“以教育为媒介”	124
第四章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历史价值之评判	133
第一节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实际影响	133
第二节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历史价值	157
余 论	174
参考书目	182
后 记	192

引言

1898年9月,在“戊戌政变”后的血雨腥风之中,蔡元培悄然弃官携眷南下,从此开始了他的新式教育生涯。而在此之前,“光绪状元”张謇已经南归故里兴办实业。在此之后,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旋即南下,加盟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故在有人论及这段历史时,即曾指出:“张元济、蔡元培、张謇三人脱离传统士人致仕旧轨,而分别转向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教育与实业,又赋予这一年以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特殊象征意义。”^①

其实,在晚清翰林中,还有一位谭延闿,后来也走上了背离清廷的“不归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四人当中,从一开始就真正自觉自愿与清政府“离心离德”的,只有蔡元培一个人;并且,真正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创办新式教育来培养变革人才而又身体力行者,也仍然是只有蔡元培一个人。蔡元培对自己的这种选择有着非常清醒的自觉性。后来,他曾忆及促使他投身新式教育的动因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②1901年4月,他在自题摄影片时也写道:“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愤世浊醉,如揉如涂。志在教育,挽彼沦

① 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后记”,中国广播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

② 蔡元培口述,黄世晖笔记:《传略》(上),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0页。

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越求同心,助我丁许。”^①1917年3月,他到任北大校长后,又致函时在法国的汪精卫说明自己归国办学的心迹说: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②

这即表明,注重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以挽救民族危亡,乃是蔡元培非常自觉的选择。这既与张謇后来从“实业救国”转向教育之路不同;更与谭延闿后来为情势所迫而投机革命迥异。另外还有一位进士出身的张元济,与蔡元培同庚(都出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浙江同乡、乡试同年、殿试同年、南洋公学同事、共同创办《外交报》,故谓与蔡元培有“六同”之处。而真正与蔡元培路向选择比较接近的,只有张元济这位与他“六同”之人。^③蔡元培一生的功业,也就从此奠定了基础。他主动脱离传统士人仕宦之常轨,投身于新式教育活动,这说明,他已把文化教育这种奠基性的长远事业看得远比一时的政治活动更重要。因此,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来看待蔡元培的功业与价值,就显得极其关键。

然而,当蔡元培因病于1940年3月5日溘然长逝于香港之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例如,在他病逝后的第三天(1940年3月7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即从延安发出唁电,称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敬献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多年故交吴敬恒称赞他:“生平无缺德,举世

① 蔡元培:《自题摄影片》,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另外,该卷编者把上述引文中的“丁戊之间”加注为1907~1908年,误也。从时间上推算,这里的“丁戊之间”只能为1897(丁酉)~1898(戊戌)年期间,而非1907(丁未)~1908(戊申)年之间。因为,若指1907~1908年,不仅与蔡元培“自题摄影片”的时间(1901年4月29日)不合,而且,也与他接受严复(侯官)和谭嗣同(浏阳)著作影响的时间不符。

② 蔡元培:《致汪精卫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③ 参见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后记”,中国广播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0页;以及吴方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失完人”；门生故旧蒋梦麟称誉他：“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等等。^①尤其是梁漱溟先生评价他的一段话，更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股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②而在被冷落多年后（1980年3月）召开的纪念大会上，蔡元培也只是被誉“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③。所以，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标准来看人们对他的上述评价，就会发现，几乎上面所有的评价都侧重于褒扬他的人格和事功。譬如，陈洪捷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曾以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概念，研究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对他在革新北大时所起的重要作用。^④而在诸多关于蔡元培的评论当中，很少有人论及到他在近代中国思想领域内的建树与影响。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看问题。在蔡元培逝世不久后（1940年3月24日），当时避居四川江津穷病潦倒中的陈独秀就曾特别撰文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⑤。周作人在1942年撰文纪念蔡元培时，则是更为明确地说：“蔡先生在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根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⑥而到1988年1月蔡元培120周年诞辰纪念时，他又开始被誉为“中国近

① 毛泽东：《致蔡元培先生家属唁电》，周恩来：《挽蔡元培先生联》，吴敬恒：《挽蔡子民先生联》，以及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51、98页。

② 梁漱溟：《纪念蔡先生——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③ 宋庆龄：《在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会上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④ 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6月，第129～130页。

⑤ 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戚谢美、邵祖德编：《陈独秀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

⑥ 周作人：《记蔡子民先生的事》，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代史上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①。虽然,比较而言,这里只是从“科学家”到“思想家”一词之差,但它却表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蔡元培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价值。

尤其是在1998年北大的“百年校庆”之际,蔡元培更是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赞誉和尊崇。1998年3月21日,在纪念蔡元培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原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先生指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主张,也体现着容纳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和发展学术文化、改革学科的思想。他从反对学术上的专己守残出发,认为对东西文化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曾提出,注意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主张大学课程内容要努力增加世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同时又认为,对外国科学文化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并且认为,不仅要吸收世界的先进科学文化,而且要把重点放在掌握它的先进的知识与方法之上,以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明。蔡先生的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无疑也是非常正确而深刻的。”^②

于是,人们或许要问:在蔡元培身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何以会出现上述从看重他的“功德”向注意他“立言”的微妙变化?对此,有一种解释说:“蔡先生晚年因职务冗忙,不能专心著作”。^③言下之意,是他的著述较少。更有人干脆说:“蔡元培毕竟不以学术与文章名家,或者换一种说法,其‘言’被‘功德’的声名光芒遮蔽,退居其次,不为世所重。”^④这其实是说,他的“立言”远不如他在“立功”和“立德”上的贡献大。这些看法乍看之下似乎都有道理,但我以为它们都还未能找到真正的原因之所在。在我看来,一方面,蔡元培自己“立言”的数量并不少,这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8卷本《蔡元培全集》为证;另一方面,实际上,他在思想层面上贡献也很大。所以,他在“立言”上前期被忽视,主导因素

① 胡绳:《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② 丁石孙:《在纪念蔡元培一百三十周年诞辰暨〈蔡元培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4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引文并没有提及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另一半”即“思想自由”,应该不会是引用者疏忽而致也。

③ 孙德中:《一位大教育家》,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④ 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后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还应该到他思想以外的环境上去找。虽然从他的著述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旧学之特点,在中国学术已经基本实现从旧学向现代学术转型后的今天,人们忽视他的学术影响是可以理解的;^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地位就可以取消掉。所以,当人们终于摆脱“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后,他在思想层面上的贡献也就终于像冰山般地逐渐浮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水面上,逐渐受到世人所瞩目。张汝伦先生即指出:“蔡元培作为一个重要的近代思想家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长期以来被忽略了。这只要看一下我们所能见到的近代思想史即可知之。人们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对他领导北大的成就尤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但对他教育思想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他的一些具体的教育主张上,而未深入这些主张后面有时并未明言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哲学。人们也研究谈论他的美学思想,却很少探讨美学在他的全部思想中的作用和意义。除此之外,对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就不多见了。这与他在其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不相称。……这似乎表明,蔡元培作为一个主要和重要的近代思想家的地位,实际并未得到人们的承认。”^②钱理群先生亦认为:“一方面,我们奉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另一方面,蔡元培先生的许多重要思想在本世纪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更不用说实行了。”^③这些议论都表明,今天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更为注重蔡元培在思想层面上的重要价值。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样把蔡元培的思想价值具体地彰显出来。

但是,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即使在蔡元培被誉为“思想家”后,人们所注重的也只是他的大学教育和美育等思想;而对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却几乎很少有人专门去论及。在关于蔡元培中西教育观的已有研究成果中,多是在“通论”式的研究中一般性的讨论之,而较缺乏专题性的深入研究者。或许是以下两个方

-
- ① 参见张晓维著:《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171页;夏锦缙:《徘徊于经学与科学之间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史哲》1997年第6期;以及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② 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代编选者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 ③ 钱理群:《校园风景中的永恒》,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序言”,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面的因素,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发生:一方面,由于蔡元培本人在治学特点上的新旧过渡性,使他在论述这一领域中的问题时,往往是以排比历史事实而非借助逻辑论证的方式为其观点作证明,从而使人们忽视了他在这—领域内的思想贡献;此外,他那“务实不辩”的思想特点,又使他几乎从没有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化论争,因此,他也就很少留下系统解说自己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文献。另方面,由于建国后对蔡元培教育思想评价上长期存在的“标签化”现象,人们对他的整个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够深入的;尤其是在以“激进—保守”的思维框架来处理文化教育问题的模式下,稳健中庸的蔡元培根本无法就“浮出水面”。钱理群先生在谈到建国后人们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态度时说:“人们根本不去仔细研究与思考蔡先生(以及中国其他现代教育的先驱)他们的教育思想的真正价值,而是简单地戴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帽子,拒绝承认,正是这样的‘左’的思维逻辑使我们吃了大亏,这惨重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①但是,钱理群先生可能并不知道,“标签化”的最大好处就是“节约劳动时间”,省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麻烦;不过,其问题则在于,“标签化”的层次越高,它离开真相的距离就越远。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仍有一些人研究蔡元培时,还是那么喜欢给他老人家“贴标签”。总之,由于上述诸原因,最终导致了人们对他中西文化教育观的严重忽视。

然而,从丁石孙先生上面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教育观却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如果不深入地理解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那么,对他“兼容并包”思想之理解,也就失去了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内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教育之关系这一问题本身,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

① 钱理群:《校园风景中的永恒》,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序言”,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①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领域中,当然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中西”关系的这一重大课题。抱定“教育救国”宗旨、较早就开创新式教育的蔡元培,在处理文化教育领域中的“古今中西”关系时,无疑显示了自身很强的独特性。^②因此,在世界日趋“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无疑将给我们今后的新文化教育之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研究者选择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领域。在这一问题领域中,本书准备主要讨论以下问题:其一,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其二,他何以能够提出“融合创新论”?其三,他如何看待和处理中西文化教育之关系?其四,他如何理解中西文化教育的融合与创新之机制?其五,他的“融合创新论”对其观念和行动有什么实际影响?其六,他的“融合创新论”在理论上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和价值?其七,他的“融合创新论”对今天的文化教育建设有何启迪意义?

在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研究者将努力坚持以下三个基本立场:

第一,以“同情”之心尊重历史的客观性。^③历史研究者应尊重自己所面对的历史事实,其实是一种最基本的“专业忠诚”。这要求研究者不能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而随意改写历史进程。然而,另一方面,中外伦理学家大都承认:“同情”是人类道德的活水源头。^④当代新儒家们也要求,研究传统文化时应抱有一种“同情”和“敬意”。因为,“同情和敬意是实现对中国文化客观了解的前提,没有同情和敬意,就不可能实现对中国文化的真实了解。”^⑤“同情”其实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境遇,能够给以“设身处地”之着想。这要求,研究者应尽可能在解

① 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② 参见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代编选者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吴方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以及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后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③ 参见[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2~70页;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54~60;以及董标:《继承方法和态度的“万年虫”》,《中华读书报》1998年8月19日,第11版。

④ 参见何怀宏著:《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8页。

⑤ 颜炳罡著:《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